

导 言

第一节 清代史学的地位与史学思想的特点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清代史学也进入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衰老的景象。一方面,旧的生产关系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且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地发展,虽然还远远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但也为新的思想因素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就史学发展来讲,传统史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来的变化和发展以后,到清代,史学思想和文献的积累已相当丰厚。传统史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为人们总结、评价,并不断探索。到了清代,与封建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传统史学中的种种现象也亟待进一步审视、评判。从总体上看,清代史学具有总结和嬗变的特点。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言:“有清一代史家,一方面是沿着传统史学的路径继续行进;另一方面,是有识的史家,力求开拓,他

们不满意史学的现状,提出史学变革的主张。”〔1〕清代史家开始从历史和史学两个层面上审视、评判过去,提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史学见解。在这种批判总结的过程中,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提出了变革史学的要求,传统史学中开始孕育着新的史学倾向。就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史来看,清代史学处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关节点上。对上而言,它具有批判总结的特性,对下而言,正是在这种批判总结中孕育出了诸多启迪后人的新的史学见解。清代史学的诸多方面,都直接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侯外庐先生曾说:“中国思想史有一个优良传统。每到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思潮也就有了转向和进步,这个阶段的中国哲人便做出他们自己时代所能做出的总结。”〔2〕就清代史学思想发展来看,也是如此。随着清代社会及时代思潮的不断变化,清代史学思想也表现出阶段性发展,具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644 年清开国到雍正去世。顺、康、雍三朝是清初史学思想发展阶段,大约 90 余年时间。

第二阶段:从乾隆到嘉庆中叶。人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史学称为乾嘉史学,大约 70 余年时间。

第三阶段:嘉道之际。即从嘉庆后期到道光二十年(1840 年),大约 30 余年时间。

〔1〕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 288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2〕 侯外庐:《论明清之际的社会关系与启蒙思潮的特点》,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第 65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四阶段 道光二十年以后,直到清帝逊位。由于这一阶段已进入近代,西方各种思潮长驱直入,因此史学思想又有小的阶段性发展。这段时间大约有 70 余年。

每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的发展都会呈现相当复杂的面貌,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但同时,每一时代史学思想也都有它相对稳定的因素,即有它的主流,使得这一时代史学思想在总体上表现出与其它时代不同的特点。就清代史学思想而言,在整个封建时代史学发展的后期,表现出与宋明史学思想极不相同的特点。

征实求真 是清代史学思想的一大特征。清初,鉴于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流弊,注重实事、事功的实学思想高涨,诸大家汉宋兼采,重义理又重征实。乾嘉汉学鼎盛,更重求真求实。嘉道以后,汉宋合流,征实与义理又统一起来。征实求真始终是清代学术的主流。这一主流影响到治史,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始,中经胡渭、阎若璩,再到乾嘉诸大家,再到龚自珍、魏源以及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者如徐松、张穆、何秋涛诸人,他们的学术渊源、治史水平、思想特点颇不相同,但征实求真,不尚空言,反对无谓褒贬则是共同的思想特征。史学思想上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是清代史学思想不同于宋明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清代史学贯彻始终的思想。清代史学思想征实求真,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在历史评价标准上,由推崇道德主义到崇尚‘实事求是’,这种思想体现在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

追求‘独得’也是清代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有清一代,众多史家在治史时宣称‘自得’、‘独得’、‘空无倚傍’、‘别识心裁’等。浙东史家,自黄宗羲到章学诚,均重独得与专家之学,宣扬

治史贵自得,贵创新。戴震、钱大昕、阮元等以‘实事求是’相砥砺,不专主一家,不依门傍户,为学必求其是,从另外一面为‘独得’之学做了诠释。清代史学思想中重‘独得’倾向的出现,是对长期以来受制《春秋》笔法、正统之论的治史思想的反动,是史学思想的一种进步。

经史关系之辨贯穿清代史学思想发展的始终。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是清代史学思想中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钱大昕、王鸣盛、崔述、袁枚、章学诚、龚自珍、张采田、章太炎等等,前后相继,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这些论述内涵不尽相同,但打破经、史之间的壁垒,以经为史则是其共同点。清代重视经史关系的辨析,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后期史学酝酿自我变更的一种表现,在史学思想史上很值得重视。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学思想还具有某种启蒙特色。清初及晚清史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在历史思想的层面上,产生了早期民主观念。黄宗羲、顾炎武、唐甄、吕留良、陈确、颜元、戴震、焦循、凌廷堪、阮元、汪中、俞正燮、龚自珍等人张扬人的个性,重视人的自然权利,肯定人的‘私欲’及‘为利’的合理性,认为它们是人类活动的原动力,提出‘达情遂欲’的为治之道,其历史观中注入了对人自身的关注。乾嘉考据学,既非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亦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立,实有一种超越现实利害的纯粹求知务实的精神。这种史学研究中知性精神的发展,也是清代史学思想具有启蒙意识的表现之一。

正是因为清代史学思想中的这些因素,晚清以后,在中西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跨越。清代史学

思想中批判专制的见解、反思制度之得失的观念、重视人之个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以及历史研究中严于考订的治史方法，都被后人吸收，成为建构新史学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

第二节 汉学、宋学与清代史学思想

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史学思想的演变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走向、学术思潮紧密相连的。就清代史学思想而言，它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转变，都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转变及汉学、宋学的相互争斗分不开。因此，我们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特点，既要注意清代社会对清代史学的影响，又要研究清代史学与宋学、汉学的相互作用，以便更准确地揭示清代史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规律。

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谓汉学、宋学之分，始自清代。刘师培曾说：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1〕

汉学一词是清人的发明，又称朴学，又称考证学、考据学等。因

〔1〕刘师培：《左庵外集》卷九《近代汉学变迁论》，见《刘师培全集》（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为乾嘉时期最为兴盛,故又称乾嘉学术。清人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的治学风格,故而用‘汉学’命名自己所从事的经学研究,^{〔1〕}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与汉学相对的是宋学,所谓宋学,即宋明理学,其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汉学和宋学走着两种不同的治经路径,贯穿整个清代学术史,成为研究清代文化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探讨清代史学思想的状况,不能不探讨史学与汉学、宋学的关系。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因为有清一代,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斗争之中有合流,合流之中又有斗争,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它对史学的影响,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清代毕竟是汉学占学术上风的时代,因此,我们还须专门探讨汉学与史学的相互作用。

清初,顾炎武首揭经学大旗,展开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的批判,指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2〕}他认为古之理学就是经学,舍经学便无理学,因此,学者应‘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尤务本原之学’。^{〔3〕}而今之理学‘不取之五经’,只凭借‘语录’‘帖括’之文,不是经学的本真,是禅学。顾炎武治经以汉学为起点,主张从文字音韵入手以求义理,开始了汉学与宋学的分化,但顾氏反对的是宋学

〔1〕 刘师培:《左庵文集》卷九《清儒得失论》。

〔2〕 《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2 版。

〔3〕 《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见《顾亭林诗文集》。

空疏之风,对宋明经注他还是兼采的。

继顾氏而起的阎若璩、胡渭,通过辨伪证明宋学错谬百出。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使宋儒所推崇的《古文尚书·大禹谟》关于尧、舜、禹个人修养和治国原则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胡氏撰《易图明辨》,指出宋儒推崇的《易图》不过是五代道士所伪造。这些,都使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客观上让人看到了宋学的空疏与无据。与此同时,毛奇龄、万斯同等均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性理进行了批评,并主张治经尊汉,用回归原始经典的方式剥去宋学的虚妄。

清初诸儒批判理学,并未完全脱离宋学的影响,而是兼采汉宋,所谓‘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1〕}清初诸儒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中,汉学与宋学开始分化,但未形成鲜明对立,汉、宋二学交互影响当时的学术风貌。

这一阶段的史学,受汉、宋二学共同影响,一方面表现为重史料考订,言必有据,理必切实,开始将文字、音韵、训诂等治经的方法移而治史。另一方面又重视理论阐发,夷夏之防的正统观念强烈,经世致用思想高扬。清初史学研究给人的感觉是功力扎实,思想深邃,极少主观臆断,这正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产物。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史学研究都有这一特点。

及至乾隆朝,汉学鼎盛,朝野无不知许、郑、贾、马者,人们治学‘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 341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儒者,则相与诮笑”。〔1〕与汉学的兴盛相比,宋学归于沉寂。这一时期,多数学者尊汉泥古,迷信汉儒训诂之学、解经之说。他们普遍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说经要比宋儒可靠,且汉儒治学,家法师承,不易走样,异于宋儒以臆说经者。在此风潮下,人们纷纷批判宋学的空疏无当,出现了吴派和皖派两大汉学营垒。他们高扬汉帜,识字审音,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意,由文字训诂以求经书义理,认为训诂明义理自明。这一时期,有些学者在坚持汉学立场的同时,也能看到宋学的优长,钱大昕、纪昀、戴震、焦循、阮元、翁方纲等都认为汉、宋之学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长,应有持平看法,不能囿于门户,横加排斥。但他们毕竟是站在汉学立场上看待这些问题的,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上,宋学的影子极淡。

这一阶段的史学,其特点也主要是受汉学影响而形成。当时,运用文字、音训这些治经方法以治史已成时尚,人们运用治经的方法整理史籍,纠缪补阙,注重史料之真与历史之真,实事求是,主张以史实说话,反对驰骋议论,史学研究中“博古”倾向明显。

嘉庆中后期以后,汉学脱离实际、琐屑拘执、崇古复古的弊端暴露出来,宋学营垒中人开始对汉学攻击。方东树等人均极力攻击汉学,汉宋之争又起,作为乾嘉学术主流的汉学开始衰落,宋学再次抬头。但由于道咸时期,时局危机,各种思想开始复活,今文经学、陆王心学、诸子学均又走上历史舞台,为变法改革提供思想武器,因此更多的人认识到无谓的汉宋门户之争于世无补,于是开始调和汉宋,汉宋合流又成趋势。

〔1〕 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复黄又园书》。

这一时期的史学,面目庞杂,今文经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变易进化观,注重史料考订的治史风格也依然延续。由于宋学的抬头,史著中重名节、重笔法义例的情况再次出现,严密考证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史思想被人重提。

总之,由于时代变迁,学术分合,清代史学与汉学、宋学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但如仔细探讨,它们的相互作用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宋学,也即理学对史学的影响,吴怀祺先生在《宋代史学思想史》一书中已有精详的分析。^{〔1〕}其各种表现形式,在清代是以一种萎缩了的方式存在着的。尤其是以“天理”谈历史盛衰,以《春秋》褒贬笔法著史,以正统论解释王朝更迭等史学观念,在清代官修史书及正统史学中有所表现,但在汉学及汉宋合流思潮的巨大压力下,影响不大,不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可以这样讲,宋明时期那种占主导地位的讲褒贬、重史法的理学化史学,在清代已走上绝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是在汉学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与宋明理学化史学风格迥异的风貌。

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

〔1〕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第一章第二节,黄山书社 1992 年版。

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释经典’,〔1〕“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2〕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3〕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

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4〕

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

〔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3〕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见《戴震全书》之三十四《戴氏杂录》,黄山书社 1995 年版。

〔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 年版。

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颠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1〕

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贯通经史的治学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

〔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

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1〕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和“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读古人书,先须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2〕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弨对古书行

〔1〕 张之洞:《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序》。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一《答问八》。

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代理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1〕}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撝‘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2〕}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3〕}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

〔1〕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第一章第二节,黄山书社 1992 年版。

〔2〕 《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

〔3〕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则不甚经意”;“传闻多谬”。〔2〕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3〕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

〔1〕《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一《李昭德来俊臣书法》。

〔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新五代史记》条。

〔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

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讨论历史盛衰,而是就事论事,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的原因是‘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史学上的‘博古’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等

历史客观性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经世致用。

关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三个问题还需要说明：

其一，有清一代，经学和史学都很发达，乾嘉学者在治学上打通经史之间的间隔，从经史结合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一方面使当时兴盛一时的汉学对史学起作用，另一方面史学对汉学也同样有影响。汉学所研究的许多东西，与上古史密不可分，汉学家为了解决经书中的典制名物，常常要借助史学，史学为汉学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和印证材料。再加上汉学本身特重史实，不虚言说经，许多汉学家治经实际上也是考史。如三礼方面的考证，像江永的《仪礼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图》、戴震的《考工记图》、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程瑶田的《通艺录》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古代礼仪进行考证，广泛引证史实以助经说。在宋儒那里，史学思想是理学家构建体系的必不可少的“半壁江山”，天理体现在纲常礼制上，离开历史，无法证明这一点。在清儒这里，史学又是汉学考据的重要方面，离开了历史事件、人物、典制等历史的说明，经学考证只能是个空壳。

其二，清儒的汉学研究，在客观上破除了经书的神圣性，为“六经皆史”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乾嘉学者所考经书，多为两千年封建社会奉为圭臬的经典，具有思想上的绝对的权威性，但一一被考出谬误。虽然乾嘉学者一直宣称他们是考辨宋明儒

学之非,寻求圣人经书本旨,但或多或少仍然动摇了人们对这些经典的信任度。面对这些错谬百出甚至是伪书的“经典”,人们不能不对由此阐发出的义理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恰恰是思想解放的先声。

明清时期,“六经皆史”的理论不断被人发展,乾嘉汉学家的经史考证,又将其理论推上新层面。他们在将经典还原为历史文献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书和史书一样,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必须“考信”的内容,经书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所具有的解经方法,在清儒的考证之下,都转化为史学的内容。经与史之间不可逾越的畛域,在经史考证之下已不复存在。尽管阐发“六经皆史”最为系统的章学诚对汉学繁琐学风和宋学虚浮学风都有批评,试图通过“六经皆史”的提出将他经世致用的主张赋予实实在在的意义,带有超越汉宋二学的意味。但不容置疑的是,“六经皆史”的命题中确实包含有六经是史料的含义。汉学家通过考证将儒家经典的史料价值揭示出来,客观上为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中具有理性色彩的内容提供了佐证。

其三,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情况极其复杂。有清一代,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各派经说先后崛起,它们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吸收,与史学的发展过程相互作用。汉学内部,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等不同学术派别,治学风格也有很大差异,反映在史学上也就有不同。因此,清代史学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各种经学思潮都在史学思想上有折光。而同时,传统史学思想所固有的信史原则、直书精神、经世观念等思想内涵又对各种学术思潮的偏差起着扭转作用。宋学的空谈性理与史学求真相矛盾,汉学的考证求实又与历史哲学的思辨相凿枘,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秉